

张岂之 主编

刘学智 副主编

中国

学术思想编年

先秦卷

梁涛 刘宝才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岂之 主编 刘学智 副主编

中国学术思想编年

先秦卷

梁 涛 刘宝才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 ZZ6N073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学术思想编年. 先秦卷/张岂之主编;梁涛,刘宝才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2

ISBN 7-5613-3488-5

I. 中... II. ①张...②梁...③刘... III. 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先秦时代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5584 号

张岂之 主编 刘学智 副主编
中国学术思想编年·先秦卷
梁 涛 刘宝才 著

责任编辑 孟庆荷
责任校对 郭健娇
装帧设计 吉人设计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邮政编码: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h.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0
插 页 4
字 数 440 千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
印 数 1-4000
书 号 ISBN7-5613-3488-5/B·107
定 价 全套(六册)240.00 元,本册 40.00 元

开户行:光大银行西安电子城支行 账号:0303080-00304001602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 话:(029)85307864 85233753 85251046(传真)

Introduction

A Chronology of China's Academic Thoughts, designed on the chronological sequence basis, is a work of the history of the academic thoughts, divided into the Volumes of The Pre – Qin Days, Qin and Han Dynasties, Wei and Jin,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nd Five Dynasties,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and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greatest possible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include the academic thoughts in the studies of history, politics, laws, Chinese characters, in various periods of China's ancient times, involving histories of the academic thoughts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Taoism, Logicians, and Legalists, the academic areas of the histories of Confucianism, Taoism, Buddhism, I Jing, politics, literatures, catalogue studies, and logic. The work also gives full considerations to the spreading of Christianity, Islam, and other exotic religions in the last period of Tang Dynasty. This book offers to the undergraduates, graduates and researchers in humanities, history, and philosophy studies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referential historical materials showing the academic thoughts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China's history, which are differentiated and analyzed to be rearranged in a systematic manner with the emphasis on the academic thoughts, activities, events, figures, books and records.

序 言

张岂之

《中国学术思想编年》是八年前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提出的选题。这个构想颇有学术意义,对此,我有以下的一些认识与体会。

我国近代学术大家梁启超、钱穆各有“学术史”著作传世,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他们所说“学术史”相当于汉代班固《汉书·艺文志》的某些内容,用现代词汇似可称之为“观念文化”,含哲学、经学、史学等的思想观点、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先秦时期《庄子·天下篇》有“道术”一词,与后来的“学术”有相同内容。清代章学诚写《文史通义》,其中所用“学术”一词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

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有些学人从日本移植“思想史”一词,并将“思想史”与“学术史”连用,将观念文化作为历史学的一部分进行研究。如侯外庐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版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就是很好的例证。这些著作在二十



世纪中期经过整理和补充,改名为《中国思想通史》出版,将“学说”一词删去了。对此,我过去没有留意,也未向外庐先生请教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动。后来我想,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人们有这样的共识:“学术”与“政治”不同,各有自己的领域和研究对象,不应混同,但是思想学说中的某些内容与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或称之为“经世致用”或“治国平天下”)有一定的联系,不能截然分开,因此不用“学术思想”或“思想学术”这样的词,直接称之为“思想史”。不过这只是一种猜测,未必准确。在国外,例如日本学术界以《中国思想史》为书名的著作并不少见。在西方以“思想史”为研究课题,并有专著出版的,可列出许多。^①

历史进展到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中国学术史的研究受到学人们的重视,以“中国学术史”作为书名的,有:李学勤主编《中国学术史》多卷本,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张立文主编《中国学术通史》多卷本,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人物卷);还有张国刚、乔治忠著《中国学术史》,东方出

① 在西方,思想史及相关的英文表述有:1. Intellectual History,这种表述突出的是理智、知识等活动,如斯特龙伯格(Roland N·Stromberg)的《现代西方思想史》(A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其中译本由刘北成、赵国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版。2. History of Ideas,可译为观念史,也有译为思想史,如 6 卷本《新思想史词典》(The New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NDHI], by Marianne Cline Horowitz, Charles Scribrer's soms, 2004)等。3. History of Thought,直接译为思想史,这个词与 idea 有相近处,但也有不同,thought 和思想(thinking)关系密切。如斯考贝克莱的《西方思想史》(A History of Western Thought: From ancient Greece to Twentieth Century, 7th edition,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1)。还要提到史华兹的《(中国)古代思想世界》,B·J·Schwartz,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中译本由程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

版中心 2002 年版;程裕祯主编《中国学术通览》,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 年出版。也许我这里所列并不完全,但从书名来看,以上著作不再冠“思想学术”或“学术思想”这样的词,有的著作并不研究思想史(或称观念文化,或理论化的社会意识),有的偏重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有的着重典章制度的源流演变,有的偏重于历史文献、出土文献和文物的研究等等。毫无疑问,这些都属于“学术”的内容,书名为“学术史”无可挑剔。不过,这样的书名(至于书的质量是另一类问题,这里不论),使著作的主题过于泛化,显不出个性和特色来,这不能不说是缺点。至于专门研究观念文化的著作,只用“学术史”作为书名,好像缺少了什么,并不理想。笔者认为,专门研究思想史的学术著作,直接冠以“学术思想史”,似乎更加贴切一些。这不是什么名词之争,实际包含了关于学科特色、主要内容、著作主线等重要问题。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提出《中国学术思想编年》选题,笔者觉得比较完整。这里所说的“学术”是以中国思想史为主干的学说史。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有的学人将综合性的思想史研究分解为哲学史、政治思想史、美学思想史、伦理思想史、逻辑思想史等,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学人们研究哲学史与思想史的联系与区别,甚至讨论所谓“中国哲学存在合法性问题”(如果用西方某些学术流派对“哲学”的理解来套中国哲学,自然会产生中国是否有哲学的问题)。针对此,有些学人认为,在研究中扩大范围,以中国学术思想史的整体为背景去研究中国哲学,也许会对中国哲学的特点认识得更加清楚。于是综合性的思想史研究又提到了重要的位置上。《中国学术思想编年》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开始编撰的,它关注的是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主流观念文化,强调其综合性、整体性和学术性。

《中国学术思想编年》采取我国传统编年史的特殊表现形式,按照历史和时间的顺序,将有关学术思想上的代表人物、著作、活

动、影响等方面联系起来,力求使学术思想的历史演进、学派关系、学术影响、学术传承等方面展现于读者之前。这种叙述方法前人已经用过,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刘汝霖著《汉晋学术编年》就是一例。由于时间的推进,该书难以反映中国学术思想的全貌,即或就是汉、晋阶段,也有许多不足。因此我们希望在刘汝霖叙述方法的基础上能有所前进。至于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共四卷,辽海出版社1998年出版),和我们以学术思想为主线的编年史在内容上有所不同,只能间接地加以借鉴。

以上提到的只是从著作的叙述方法出发,没有论述研究方法,其实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有一定联系,又有区别。叙述方法不能代替研究方法。在学术思想的研究中,如果研究者只是借用某些史料来佐证研究者个人的思想观点和方法,不能否认这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即通常说的“我注六经的方法”,会有一些智慧点。然而从总体上说这并不是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不是从具体的历史运动中去发掘历史的智慧;历史与逻辑没有达到统一。我们力求在《中国学术思想编年》中运用具体的历史分析方法,去揭示历史文化的实在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史是历史学的重要部分。这样,我们在研究方法上并不限于形式,而力求上升到历史辩证法的高度。因此,从形式看,《中国学术思想编年》是传统的,而从实质上看则是现代的。传统的叙述方法与现代的研究方法可以统一。不过,究竟做到了几分,我们没有把握,最有发言权的应当是读者朋友们。

《中国学术思想编年》只是一部史料汇编?我认为不能这样说。从全书看,史料的罗列与研究的论点相融合,力求揭示相关条目之间的思想联系,同时又在每分卷前勾勒各个断代的“学术思想史概述”,简要地阐明作者对于该时期学术思想的理解,便于读者们从理论观点上了解学术思想的概貌。

还要提到,本书在条目之下,除写有“内容述要”和“文献引证”两部分外,还在相当多的条目中写了“考辨”。在研究中,我们发现许多学者(特别是明清以前的)其生卒年月不准确,现行的诸多辞书也未加翔实考证,以讹传讹的情况时有发生,究其原因,是与史料本身的不一致乃至矛盾有关;有些著作的作者或撰写年代有误,或篇目、版本流传情况不清;有些有较大分歧的学术争论也常与史料记载有关。所有这些问题是我们撰写学术编年史不能回避的,应当加以解决。因此,凡遇到此类情况,我们一般都要做出考辨,提出一些看法,供学术界参考。如一时难以得出结论,也要将目前学界研究的情况加以介绍,以供读者检索。

本书选目的原则,是以与思想范畴(即观念文化)相关的内容为主,涉及史学、哲学、宗教以及政治法律思想、文献学(包括目录、校勘、考据)、谱牒学等。对于文学,仅限于相关的学术思想方面。上述内容往往渗透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儒、道、释以及哲学史、史学史、文学史等诸多交叉领域,其资料可谓汗牛充栋。但是,我们这一部容量有限的学术编年,不可能尽皆列入,只能依上述原则有所选择和取舍。当然,涉及具体的个案选取,也许会见仁见智,在此我们把握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注意选取能够反映学术思想的变迁,代表学术思想的某个方面,在学术思想史上有较大影响的学人、著作以及对学术产生过影响的事件等。总之,在立目时尽可能不要有重大遗漏。同时,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各个历史时期的主线或侧重点并不相同,甚至有一定的差异,例如汉代以经学思潮为主,魏晋以玄学思潮为主,隋唐时期逐渐转向以佛学思潮为主,宋明以理学思潮为主,清代则又有朴学等等。为了使主线突出,我们在注意到各个时期学术思想特点的同时,在总体上突出儒、道思想和史学这两条学术线索。魏晋至隋唐时期,头绪还要复杂一些,宋明理学学派众多、相互关系不易理清,遇到这些情况,我们也尽

可能地贯彻这一原则精神,力求不离主线去立论。总之,资料性、学术性、理论性、工具性为一体,是本书追求的目标。

本书共分为六卷,包括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元卷、明清卷。先秦卷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梁涛博士、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刘宝才教授撰写,他们是多年从事先秦思想研究的学人,对先秦时期学术思想有过多方面的研究。秦汉卷由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郑杰文教授及其助手李梅博士撰写,郑杰文教授是文献学研究和秦汉学术思想研究方面的专家,曾出过数部相关的著作。魏晋南北朝卷由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刘学智教授和江南大学中文系徐兴海教授共同撰写。刘学智教授一直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徐兴海教授长于古籍整理,又多年从事中国思想史的教学研究,两位合作撰写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儒道释相互交错、相互对峙又相互融合的魏晋南北朝卷,应该说有很好的互补作用。隋唐卷由刘学智教授独立完成,他曾参与魏晋、隋唐儒学史的撰写,撰写此卷他用了很多的精力。宋元卷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李似珍教授撰写。李似珍教授长于古籍整理,又有多年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经验。明清卷由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陈国庆教授及其助手刘莹副教授撰写,陈国庆教授多年从事明、清时期及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他们用几年时间撰写了本书相关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尚未将近代、现代学术思想列入撰写计划范围。一是因为中国古代虽然各个时期学术思潮并不相同,但基本属于传统学术范围,其思想特征、基本内容、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有诸多一致或相通之处,而与近代、现代学术迥然有别,因为近、现代思想学术史必须论述传统学术向近代的转型,而且有中学与西学的相互关系问题。因此,本书将下限断在清末。其二,因为近代以迄现代学术,对诸多学术问题的认同,还需要经过长时期的历史

检验,只有待日后再说。

本书撰写之初的1997年12月,我们曾组织作者们开了一次研讨会,进一步明确本书的主题思想、选目原则、基本内容、体例及细则等,并将相关的编撰原则基本确定下来。随后,作者们开始了书稿的撰写。在书稿初成之时,我们又于1999年12月召开了一次初稿研讨会,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清华大学彭林教授、聊城大学王世舜教授、暨南大学范立舟博士及本书所有的作者参加研讨。本次会议对已撰成的初稿进行了初审,与会专家们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会后,作者们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们一起,用了五年多的时间进行补充、修改甚至改写,直至2004年底才全部脱稿。在此,我对参与本书撰写的专家表示感谢!

像《中国学术思想编年》这样近乎历史文献的综合性学术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八年的努力和多次修改才得以完成。尽管如此,其中的缺点、错误仍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学者和读者朋友加以批评指正。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陕西师范大学刘学智教授,他作为这部书的副主编,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学术组织工作,而且亲自操觚,在许多篇章都有他劳动的成果。我还要感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特别是张军孝副主编和侯晋公编审。他们认真地审阅稿件,并请对古籍有修养的老编辑核查书中某些原始资料,力求减少错误。没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这部书是难以问世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是想起抛砖引玉的作用,为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一点思路。我觉得,中国思想史学科中还有不少问题值得做深入研究,例如关于思想史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关于思想史与哲学史的联系与区别;关于学派的研究;关于近代中国思想学说的转型以及中、西学的关系等等。还有出土



文献中所反映的思想观念,有不少有意义的内容值得发掘。学界朋友的相互切磋,才能推动中国思想史学科的深化发展。至于本书的缺点甚至错误,希望能得到朋友们的指正。

2005 年 8 月

先秦学术思想史概述

先秦学术思想与先秦社会平行发展,经历了若干历史时期。与宗族国家形成相应,周初建立起天命神学思想体系。随着宗族国家衰落,天命神学思想发生动摇。经过春秋时期的社会变革,宗族国家瓦解,思想学术领域也出现“道术将为天下裂”^①的现象,形成“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产生了各具特色的诸子学说。在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形成过程中,学术思想又走上综合发展的道路。综合与分化交替是学术思想发展的规律。先秦学术思想发展走过一个综合——分化——再综合的周期,积累了丰硕成果,奠定了近两千多年中国文化的基础,基本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模式。本文准备对周代学术思想发展作一鸟瞰式论述,希望有助于广大读者进一步阅读、掌握周代学术思想的丰富内容。

一、西周的天命论

西周初期^②是一个富于建树的时代,学术思想史上主要有三

① 《庄子·天下》。

② 一般将西周(公元前1045年—公元前770年)历史分为三个阶段。武王、成王、康王时为初期,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时为中期,厉王、宣王、幽王时为末期。

件大事：箕子述《洪范》，周公阐发德治思想和《周易》^①的成书。

武王灭商后，殷贵族箕子归顺周朝，武王问以治国之道，箕子向武王陈述了据说是上帝赐予大禹的九类治国大法，即《尚书·洪范》篇的“洪范九畴”，或称为“大法九章”^②、“大法九等”、“大法九类”^③。其内容为：（1）五行（水、火、木、金、土的性质和作用）。（2）五事（对君主貌、言、视、听、思的要求）。（3）八政（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兵、师八项政事）。（4）五纪（年、月、日、星、辰五种计时方法）。（5）皇极（君主建立的准则）。（6）三德（正直、刚克、柔克三种统治方法）。（7）稽疑（卜筮的运用）。（8）庶徵（雨、晴、暖、寒、风等检验君主得失的征兆）。（9）五福六极（五种幸福和六种不幸）。

周公是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周公辅佐成王平定武庚、管叔、蔡叔叛乱，营建东都洛邑，创立礼乐制度，奠定了周代国家的基础。在处理国家大事过程中，周公发布的一系列诰命阐发了德治思想。这些诰命被记载下来，就是《尚书·周书》中的《大诰》《多方》《召诰》《多士》《康诰》《酒诰》《梓材》《无逸》《君奭》诸篇。周公德治思想的核心是“明德慎罚”^④，有四个要点：（1）“天惟时求民主”^⑤。认为君主主宰天下的权力是上天授予的，神圣不可侵犯。上天总是在寻求代天治民的统治者，当君主违背上天意志而又不愿改正的时候，上天就会收回授权，改立重新选中的人为天子。历史上夏、商两代的统治权都是上

① 文中《周易》指《易经》，不包括《易传》。

② 《汉书·五行志》。

③ 《史记·宋世家》。

④ 《尚书·康诰》。

⑤ 《尚书·多方》。



天给予的,后来夏、商统治者相继腐败作恶,违背上天的意志又不悔改,上天也就先后收回了授予他们的统治权,转授给重新选定的族类。获得“天命”的族类,秉承天意推翻已经丧失“天命”的族类的统治,就是“革命”。成汤“革夏”,武王“革殷”^①,都是执行上天的意志,是讨伐腐败罪恶的统治者的正义壮举。现在上天将“民主”的地位授予周人,周人只有谨慎地遵从天意,才能保持统治权。(2)“明德慎罚”。治国要德教与刑罚并用,而以德教为主,刑罚为辅。治国者首先要为人民树立道德榜样,教化人民敬养寡弱,而不互相残害。其次才是处罚犯罪的人,而在处罚罪犯的时候,要区分是否故意犯罪和犯罪的性质。对于非故意犯罪而又悔改的人要从轻处罚或赦免,只有对故意犯罪的人和不孝不友以及违犯国家大法的人,才可以从严治罪。(3)“人无以水监,当以民监”^②。要从人民的反映考察政治措施的得失。治国者要体恤“小人”稼穡的艰难,关心“小人”的疾苦,勤政爱民而不追求享乐。如果听到“小人”有怨言,自己要更加敬德慎行,而不可对抱怨的人乱加惩罚。(4)推行礼乐制度。礼是制度仪式,乐是舞乐。以乐辅礼,共同体现德治。周公认为,德治是“欲至于万世为王,子子孙孙永保民”^③的治国方针。

占卜起源于原始社会,在三代进一步发展。三代有卜官,有几种占卜方法,筮占是其中的一种。《周易》是周人筮占材料的总结。相传文王被纣王拘囚期间,有“演易”之举。文王“演易”形成六十四卦的符号及某些筮辞。西周初年,周王室的卜官整理长期积存的占卜档案,经过挑选、加工,分别系于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

① 《尚书·多士》。

② 《尚书·酒诰》。

③ 《尚书·梓材》。

四爻之下,便是《周易》的筮辞。《周易》由卦爻符号和筮辞构成。《庄子·天下》篇说:“《易》以道阴阳。”由阴、阳两个符号组成八经卦,又由八经卦两两相重组成六十四卦,再用六十四卦及其包含的三百八十四爻的变化解释万事万物,始终贯穿着阴阳观念。所以《周易》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阴阳思想的最早文献。

《洪范》《周易》和周公的德治思想,统属于天命神学思想体系。《洪范》所载“大法九类”被认为是上帝所赐,《周易》本身即是占卜之书,所讲吉凶祸福体现了上天的意志,周公论政权及政权更替的合法性都归之于“天命”。但周初的天命神学已容纳了认识自然和社会的成果。《洪范》所说的五行本身不过是五种自然物质,所说的五行的性质和作用是人们长期认识自然的经验总结。《周易》中涉及面极广的知识、格言也无不是现实生活经验的总结。周公诰命中的德治思想则主要来源于夏、商两代兴亡和周族发展的历史经验,是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治国方略。

《洪范》《周易》和周公的德治思想表明,中国学术思想中的政治思想,是与宗法伦理观念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强调德治是宗法伦理观念与政治思想结合的结果。德治思想是一个主旋律,在不同文献中反复鸣鸣奏响。如果说在《洪范》中,德治思想还只是潜存在“三德”、“五事”等条目里,那么在《周易》和周公的诰命中,德治思想便已完全成形。德治思想的出现,源于历史经验,更源于西周宗族国家的性质。西周王朝是血缘、地缘结合建立起来的宗族国家,治理这样的国家离不开亲族伦理规范,离不开道德力量。我们从《易》《诗》和《尚书》中都可以看到宗族的存在,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德治思想的出现几乎是历史的必然。周公的伟大在于,他看到了德治是治理宗族国家的需要,以自己的思想顺应并满足了这种需要。

《洪范》《周易》和周公的德治思想还反映出,周初学术思想思





思维方式具有“天人合一”的特点,是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作为统一整体思考的。《洪范》把自然界的“五行”、“庶征”与人类社会的“皇极”、“八政”、“五福六极”视为相关联的整体。《周易》把乾坤天地与人类社会视为相关联的整体。周公思想中“天命”与民情、政治也是互相关联的整体。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有宗教神学性质,有幻想成份,也有古代知识积累的成果。它包含了神学与科学两种因素,有向科学和宗教两种方向发展的可能,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都有具体表现。

周初的德治是西周的正宗治国思想,它在西周中期和后期又有发展。西周中期,一方面王室对边远地区发动的征讨战争遭到失败,另一方面诸侯国之间发生矛盾。针对前一问题,穆王时的王室卿士祭公谋父提出“耀德不观兵”^①的口号,反对穷兵黩武。他认为周族自后稷、不窋、文王、武王以来有一套“先德后刑”的典训制度,规定“五服”对王室的不同义务。只要“五服”履行各自义务,就不应该动用武力。这是西周初年德治思想没有也不会有观点。针对后一问题,穆王末年有甫侯作《吕刑》之举。《吕刑》规定了刑罚的种类和执行原则,将刑罚分为五刑、五罚、五过三大类,强调执行任何刑罚要有“哀敬折狱”的精神,对犯罪的人要抱着哀怜心理,要谨慎从事。还警告执法者说:“狱货非宝,惟府辜功,报以庶尤。”^②就是说,办案收受贿赂(“狱货”)等于积累罪恶,难逃上天的惩罚。在刑罚中贯彻德治精神,把德与刑统一起来,是西周中期德治思想的发展。

西周末期,厉王“专利”被驱逐,宣王“中兴”失败,幽王暴虐导致西周灭亡。在这段历史上,一些政治家为了挽救危局,针对现实

① 《国语·周语上》,《史记·周本纪》。

② 《尚书·吕刑》。